

## 海权与英美特殊关系200年（1782—2012）

### ——对一个和平转移海权案例的研究

[英]安德鲁·兰伯特

**内容提要：**在两百多年的英美关系中，英国以海权国家的方式存在，而美国则以大陆国家的方式存在。战略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使得英美从未构成彼此的实质性威胁。英国衰落之后，将海权交给了大陆思维影响下的美国领导下的同盟。美国海军强调“陆军”使命，即决战和对大陆的力量投送。冷战以来，海洋虽然在战略竞争中处于边缘地位，但依然重要。

**关键词：**英美关系 海权 美国海军

1782年到2012年间英美关系的历史，如果按照丘吉尔的说法，可以描述为这样一个故事：在英语、法律、民主和企业制度的基础上，两国的共性获得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新生的共和国凭借其辽阔的幅员使领导权不可避免地，并且和平地进行了转移——从欧洲边缘小岛上的王国转移到大西洋彼岸另一个强大得多的国家手中，而两次对德世界大战的巨大代价则加速了这个过程。但是，这种事后做出的乐观解释会严重混淆英美两国在文化上的根本差别，歪曲它们相异的国家特性和不同的追求目标，而这决定了它们对世界的看法。

事实上，应该承认这两个国家不仅过去，而且现在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核心是对海权的性质理解不同。“海权”（sea power）一词通常用来形容任何一个拥有海岸线、财力和人力的国家对本国战略与政策的选择，而本文对海权的界定是国家对海洋事务的全力关注和支持，这种情况只适用于若干国家，

[英]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海军史讲席教授。

它们天生地，甚至一直就害怕丧失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交出海权与承认自身的深刻弱点别无二致。<sup>1</sup> 只有少数国家才能把海权打造成为它们获得大国地位的基础，而这些国家没有传统陆地大国那样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能够在它们所在时代获得大国地位的海权国家名单既简短又特别：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这些国家都相对弱小，需要依赖海运业繁荣经济、供应大部分食品，失去海洋控制权便会使它们陷入绝境。这些弱国不可能成为陆地大国，它们只有把自己的相对优势最大化才能成为海权国家，例如英国未能征服法国，所以才自觉地选择转向海上。这是一种立足于明显弱点的被动性选择，它之所以能长期奏效，是因为当时较大的国家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建立一支能够打败皇家海军的海军。当斯巴达人在伊哥斯波塔米战役中俘获雅典人的舰队，从而控制了向雅典供粮的主要海上通道、继而封锁这座城市的时候，第一个海上强国雅典就被彻底摧垮了。正是为了避免类似的命运，英国才先是同法国而后又同德国开战。英国海权战略的中心是要避免全面战争，建立起反对占支配地位的大陆国家的联盟，竭尽全力防止出现霸权或者说出现一个世界大国。

海权帝国与大陆帝国不同。海权国家控制贸易通道：它们占领港口和海军基地这些海权战略节点，重要的是避免向陆地过度扩张。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先后出现的海权帝国的关键节点是重复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海权帝国都选择同样的关键节点作为基地。例如，科孚曾是雅典、威尼斯和英国的海军基地，而作为欧亚贸易要冲的开普敦则首先被葡萄牙人发现，再由荷兰人开发，最后被英国人夺占。正如英国人在印度所做的那样，海权国家也会捍卫大陆帝国，但这通常是偶然的，而且总不是一种正常状况。它会带来文化困惑，导致资源错配，并往往以灾难性的结局收场。

依照同时代的标准，海权国家拥有先进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是确凿无疑的。这种政治体制是动员商界为长期维持费用高昂的海军提供资源的关键。这最后

一点是检验一个真正海权国家的试金石。为打仗创建海军不难，但在和平时保持海军却不易。长期维持海军力量的动力来自确保交通线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确保战略力量的考量。唯有同商人们共享政治权力，政治精英才有望获得商界的资助；只有当政治精英就海军发展的方向同商界达成一致时，商人们才能心甘情愿地成为国家维持海军的伙伴。在真正的海权国家，海军的重点是保护贸易而不是投送力量。从中长期观点看，那种与商船航运和贸易无关的纯“军事”性质的海军不可避免地要衰落，而帝俄和苏联时期的海军是最

从中长期观点看，那种与商船航运和贸易无关的纯“军事”性质的海军不可避免地要衰落，而帝俄和苏联时期的海军是最大的一个整体衰落的绝佳案例。

<sup>1</sup> A. D. Lambert, "Sea Power" in Kassimeris, G. & Buckley, J. eds.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Modern Warfare*, Farnham Surrey, 2010, pp. 73-88.

大的一个整体衰落的绝佳案例。无论怎么下定义，俄罗斯都是一个陆地大国，不需要超出其领水范围的海权。俄罗斯或苏维埃国家从未与商界分享过政权，结果便是它从未拥有一支一流的海军。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俄国人才真正循环性地重复了企图维持这样一支海军的做法。

海权国家都有海军英雄和海军文化，海军词汇也呈现于它们的语言、仪式和艺术之中。英国英语所包含的海军词汇数量远远多于美国英语。在英国，皇家海军被称为“高级军种”（Senior Service），特拉法尔加广场是伦敦的市中心，纳尔逊勋爵是全民英雄，英国人面对危机的最初反应是指望海军。无独有偶，1982年英国为进行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动员了全部海军，但同时只动员了数量很少的陆军。

海权国家接触的世界更加广阔。它们致力于了解境外其他国家，促进对外交往。它们打仗是为了贸易和至关重要的利益，不是为了领土。1982年，正是福克兰群岛居民的权利决定了英国的政策，这并不是为了多占领几英里宽的饱受海风吹袭的羊圈。海权国家的最大敌人是寻求复兴罗马帝国霸业的国家，这样一个帝国压垮了迦太基。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法国企图统治欧洲。与盟国一道，英国运用海权、金钱和规模较小的陆军部队挫败了这一野心。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对于历史无法重演而深感忧虑，他把英国的成功视为过去历史的反例，称英国人为新迦太基人，并耗费他的才智精力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会战胜他的同胞。<sup>1</sup> 在众多著名的法国政治家中，拿破仑是唯一跟孟德斯鸠学舌的人，不过在他那里“迦太基人”一词用来指滥用权力者。1890年以后，德意志帝国中厌恶英国的人士不断重复这些法国式的辱骂词语，他们重印了许多更加极端的法国人的书籍，抨击英国是一个被商业利益驱使的“迦太基人”的海权国家。<sup>2</sup> 英国人并没有对这种辱骂表示愤恨，而是很快把它当做一种荣誉标签。迦太基是一个典型的海权国家，它抵御了罗马的霸权行径。英国同迦太基一样，敢于抗拒拿破仑时代法国的野心。就像在孟德斯鸠时代那样，这次只有新迦太基人赢得胜利。为了褒扬这种关联性，英国最伟大的艺术家 J. M. W. 透纳创作了一组描绘迦太基人的画作，以纪念英国为最终打败拿破仑帝国所作出的贡献。只有当称霸欧洲的国家不存在时，英国才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发挥作用。在400年的时间里，这个现实确立了对英国安全和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打败任何潜在的大陆霸权国家。所以，“迦太基人”这个标签对英国完全适用。

作为一个海权国家，英国没有寻求领土扩张。22年的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

---

1 P. Rahe, *Montesquieu and the Logic of Liberty: War, Religion, Commerce, Climate, Terrain, Technology, Uneasiness of Mind, the Spirit of Political Vigilanc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odern Republic*. Yale UP, New Haven, 2009, pp.3-61, esp. p.59.

2 M. Stibbe, *German Anglophobia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ee pp.33, 64, 67, 70-1.

周期在滑铁卢画上休止符后，英国人最终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帮助创建了一个稳定、和平与平衡的欧洲国家体系，防止了法国或俄国重燃称霸野心，并让欧洲大陆对英国商界开放。他们夺取的唯一领土是一些小的离岸岛屿，如马耳他岛、科孚岛、赫尔果兰岛和毛里求斯。有了毛里求斯以及同它相连的开普敦，英国人得以控制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所有贸易往来。他们并不想把占领的地盘延伸到非洲腹地，相反，他们迫使阿尔及利亚人停止把欧洲海员扣押为奴。在19世纪，英国人运用技能、金钱和实力建立起第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他们靠武力或金融打破了贸易壁垒，尝试资本运动的新形式，发明并铺设了由海底电报电缆组成的第一个环球通讯网络，并利用它建立新的市场。近代世界经济是英国的杰作，因为英国需要通过全球贸易而达到繁荣昌盛。所以，一个英国发明家创造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这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惊奇。

海洋国家喜欢机敏、灵活且有限度的防务，这反映出它们在人口和资源禀赋上的弱点。所以，这些国家愿意打有限战争而不是全面战争，并且倾向于在诉诸武力时能够看清结果。这是一种强调国家利益并决心采用“英式战法”的思想，它的清晰度在需要与盟国协同作战时变得含混不明，因为这些盟国有着极为不同的、大陆式的战略构想。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抵御了展开大规模大陆式军事行动的诱惑，而是依托经济战、外围作战行动和对盟国大力提供经济援助。在20世纪，英国成了大陆国家大联盟的一员，参加了两次全面战争，由此造成的人力和经济损失使英帝国破产并分崩离析。今天英国是一个主要联盟里的中等强国，而主导这个联盟的是大陆式的观念。所以，英国的政客们看不清哪里是国家利益所在，跟着美国卷入两场徒劳无益的战争，其中最近的一场战争发生在阿富汗。而在那个国家，英国的国家利益只有在英国人不在场时才得以凸显。

尽管有着英国的遗产，美国已经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存在了二百多年，国防力量以陆军和空军为主。美国首先从法国、1871年以后又从德意志帝国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知识和文化模式。从美国陆军的战法与训练情况、美国大学的结构和美国工业的性质中都应该明显地看到这种联系。基本说来，美式作战更加专业化，要消耗更多资源，是德式战法的重量级翻版，讲究火力、技术优势、大后勤、详尽的计划和“决定性”战役。美国的食物、燃料和99%的原料都可以自给。美国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它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资源与市场保持着密切联系，没有开展对外贸易的明显需求。对它来说，海洋是无要紧要的。

美国不是一个海权国家，至少在建国之后的200年间不是。<sup>1</sup> 1794年美国创建了一支负有典型海权使命的海军：为了保卫国家航运免遭海盗袭击。虽然此后

---

1 A. Roland, W.J. Bolster & A. Keyssar, *The Way of the Ship; America's Maritime History Re-envisioned, 1600-2000*,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8, dates the end of America's maritime phase to 1817.

50年里这一使命依然重要，但美国平庸地丧失了它的海洋观。1803年杰佛逊总统从拿破仑手中获得了北美的一大片土地，这件“路易斯安那购置案”一举改变了这个新国家，使它从一个依赖一系列繁荣的大西洋港口城市的海上贸易国度变成习惯攻击邻国、夺占土地的大陆国家。近代美国就是另一个罗马帝国，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陆强权，有着令人惊叹的人力、金融和工业资源。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完好地保持着一支最低限度战力的海军，还不止一次地差点就把海军撤销。<sup>1</sup>今天美国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作战力量，但它的思维和行动依然像个典型的陆地国家，而英国则不一样。

这种哲学上的差异性对于任何一个想要理解英美两国在过去200年间关系演变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在这200年间，英国接受了自己不可避免地要相对衰落现实，把战略性海权的负担交给了美国。这种权力的转移出奇平稳，因为早在20世纪初叶美国成为世界大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就设法弥合了它们的分歧。这次转移发生在一个世纪的历程中，而这个世纪被三次全球性的冲突，即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所笼罩。在所有这三次冲突中，英美两国生死攸关的利益都交汇在一起，它们先是把德国，然后把苏联视为对自身的生存、生活方式和商业利益的现实威胁。这些威胁来自大陆，而不是来自海上。在反对潜在霸权国家的大规模冲突中，英国历来指望让大陆盟友承担军事重任，而美国不过是那一长串盟友名单中的最新一个。

自美国立国之初，英国政治家们就担心美国有潜力成为一个同英国竞争海权的国家。美国有许多港口、船只和水手，是一个富有的贸易国度，它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就是和中国做买卖的商人。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1793—1815）时期，美国人靠向法国及其属地提供船运服务和货物发了财。但是，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置案把美国人关注的重点向西转向了陆地。1812年美国人攻打了今天叫做加拿大的那个地方，想要征服这个省、把它并入美国版图。这时船只和海洋都成了无足轻重的小事。美国人还攻打了西班牙人盘踞的佛罗里达。这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加拿大人决定还是要当加拿大人。在陆地上无法取胜的美国动员了商船队，并把它作为私掠船队来使用，这是海军力量薄弱国家的典型战略选择。英国对这种挑战发动了决定性的反击，使用护航、巡逻、封锁和海岸进攻等手段消灭发动袭击的船队，并鼓励美国南部诸州的奴隶奋起反抗。拿破仑垮台后英军攻占并焚烧了华盛顿特区，为的是让美国人明白：在训练有素的军人手中，海权是一件可怕的武器。爱德华·布伦顿舰长是在美国出生的英国海军军官，在1812年的英美战争中功勋卓著。他认为，这场战争后形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置案把美国人关注的重点向西转向了陆地。

<sup>1</sup> 美国独立后整个海军都被出售，南北战争结束后海军已经破败不堪，在1940年代后期，美国的陆军和空军差点儿把海军毁掉。

成的战略平衡非常有利于英国。

“在掌控各大洋的同时，大不列颠王国可以运用其影响搅动美洲大陆，并且唤起和支持那些心怀不满的臣民。如果能像最初设想的那样从英格兰派遣2万人的军队，那么弗吉尼亚的奴隶起义就极有可能给美国南部诸州以致命打击。”

他提醒美国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一无所获。<sup>1</sup> 布伦顿的书在英国海军军官和政治家中广为流传。1812年战争以恢复战前边界的方式结束，实现了和平。在这之后的90年里，美国的战略思维中充斥着对英国海军的恐惧。美国人把他们的钱花在了海岸防卫上！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也花了不少钱，美国人还是承认他们面对占据优势的海洋力量不堪一击。<sup>2</sup> 接下来的领土扩张使美国人占领了从亚利桑那直到加利福尼亚的一大片陆地，这片土地是1846—1848年间从墨西哥手中夺得的。难怪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各国开始对它们咄咄逼人的邻国感到害怕了。<sup>3</sup>

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帕墨斯顿勋爵看到了美国的潜在力量和扩张目标。1812年战争期间他已在王国政府供职，认识到美国民粹主义政治和诸如“天定命运”之类的选举口号所构成的危险。他职业生涯中的大量时间都用来悉心观察美国的扩张主义，反对美国进口非洲奴隶的交易，阻止美国人为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至关重要的古巴离岸岛屿海军基地煽动革命。那时英国和美国相安无事，因为美国人惧怕英国的海军力量，而英国无意占领更多大陆上的土地。这种态势是典型的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对峙。1815—1861年间，英国和美国有过许多争端，但是：

“双方的政治家们总能设法避免战争。争端事项从未严重到这般地步，以至于理智、清晰的外交信号和及时的退让都不能避免一场会使双方两败俱伤的冲突。在确保了对加拿大的控制权和让西班牙人留在古巴后，英国不大可能为争夺剩下的那些地盘开战。这倒不是因为英国不能够这样做，而是因为如果这样做，会削弱它支持更重要的在欧洲利益的能力。”<sup>4</sup>

美国需要为开展外交和促进贸易使用海军（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1852年舰队司令佩里“敲开”日本的大门），但此时的海上世界依然是皇家海军占据支配地位。<sup>5</sup>

---

1 E. P. Brenton, *The Nav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Henry Colburn: London 1825, Vol. V pp.199-205 & A. D. Lambert, “Winning with out Fighting: British Grand Strateg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15-1865” in B. Lee & K. Walling eds. *Strategic Logic and Political Rationality: Essays in Honour of Michael J. Handel*, United State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hode Island, 2003, pp.164-95.

2 Lambert, 2003, p.176.

3 D. Loveman, *No Higher Law: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Western Hemisphere Since 1776*,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2010, pp.100-114.

4 Lambert, 2003, p.177.

5 J. H. Schroeder *Shaping a Maritime Empire: The Commercial and Diplomatic Role of the American Navy, 1829-1861*,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 1985.

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中，联邦政府差点同英国开战。一艘美国战舰非法在公海上抓扣了一艘英国邮轮上的乘客。当英国人动员了一支舰队要攻打纽约后，美国人很快退让，“特伦特号”（*Trent*）危机由此结束。这次危机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英美关系。英国人通常在小事上让步，但能迅速采取行动保护他们的关键利益：加拿大、古巴和国际法。帕墨斯顿首相认为，这个事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英国可以对美国人多年来的无礼言行给予精心策划的报复。

“如果联邦政府同意我们的要求，那将是英格兰的荣耀和对美国的羞辱。如果联邦政府拒绝合作，那么大不列颠就会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的地位发起严厉打击，让美国得到一个不会被很快遗忘的教训。”<sup>1</sup>

帕墨斯顿毫不怀疑英国会获胜：“除加拿大外，我对我们所有的攻防点都感到很放心，”不过“我们应该在海上有很大优势，我们必须尽量利用这种优势。”<sup>2</sup>帕墨斯顿很好地利用了伦敦的主要报刊传递他的威胁言论。在《泰晤士报》这家英国最重要的日报和被广泛认可的半官方媒体，编辑约翰·撒迪厄斯·德莱恩用对美国人的持续攻击来回应首相的信心。德莱恩反映了举国上下的愿望，要报复那些“满口污言秽语、不断挑事儿的美国人、政客、演说家和报刊”。同整个国家一样，英国的陆军、海军和民防部队也斗志高昂。德莱恩希望如果开战，那么美国人将遭受沉重打击，以至于连“埃弗里特和班克罗夫特公司也没法让他们取胜”。<sup>3</sup>

1865年以后，英国观察家们看到美国的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的军队规模和工业动员能力都显示出这个国家正在转变为一个陆地大国。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在不断缩减，它的精锐力量几乎丧失殆尽。美国关注的主要事情是统一新拓展的边疆地区、开发国内资源和在广袤的大陆上发展工业。毫不奇怪，美国人把德国当作发展的榜样。美国海军那时悄然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它毫无生气，由陈旧过时的木质炮舰组成，却要费力地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影响力的局限性是清晰无疑的，即便是对付像智利这样的本地区国家，华盛顿都无法派出比其更强大的舰队。<sup>4</sup>

1 Palmerston to the Queen, 5.12.1861: H. C. F Bell, *Lord Palmerston*, London, 1936, Vol. II. p.295.

2 Palmerston to Foreign Secretary Lord John Russell, 5 & 6.12.1861, in Bell, p.295 and Russell Papers, TNA PRO, 30/22/21 f620.

3 John Thaddeus Delane to William Howard Russell, 11.11.1861, *History of "The Times"*, Vol. II, London, 1939, p.373, 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曾于1846—1848年间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帕墨斯顿和德莱恩都很了解他。他出版过一些宣扬美国人在1812年战争中获胜神话的书籍。在这些书中，班克罗夫特鼓励受教育的美国人对另外一场战争的结果持不现实的看法，这加剧了英美之间的对立。

\* 这里的埃弗里特指19世纪美国政治家和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 1794—1865），他曾任美国众议员、参议员、马萨诸塞州州长和哈佛大学校长。1841—1845年间出任美国驻英公使。——译者注

4 Loverman, pp.140-149.

具备新的形式和规模的美国实力产生了政治性的后果，这便是围绕“亚拉巴马号”(Alabama)索偿案发生的著名争议。当英国政治家想方设法要解决相关问题时，他们也开始谋划更长远的关系格局，思考着未来。自从1840年代以来，英国史学家就一直明确地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海权概念，同时他们也研究威尼斯等从前的海权国家，把它们的历史作为分析英国面临问题的重要工具，以探讨如何避免那种被爱德华·吉本生动叙述过的帝国的“衰落”。<sup>1</sup> 约翰·罗伯特·西利1869—1895年间担任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席教授，他属于眷恋德雷克和罗利时代大英帝国光辉起点的那一代人，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西利认为近代历史是教育的优良基础，与此相联系，海权是明显贯穿其中的主题。无论在当前还是未来，运用海权都是荣耀的事业。西利不仅宣称“历史是培养治国之才的学校”，他还“一扫当时盛行的那种纯粹大众式的、浪漫的和富有想象力的历史观，在研究中运用法庭调查式的分析手段，清晰而准确地提出需要搞明白的问题”。<sup>2</sup> 作为一位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者，正如人们或许期待的那样，西利把历史学视为一门社会科学，对海权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一部被历史学家和战略家都忽视的著作中，西利强调：大西洋贸易的出现对荷兰和英国的影响就如同地中海贸易激发了希腊和罗马的智慧一样。进一步讲，大英帝国对法国的

大英帝国对法国的优势就在于专心致志地谋求海权，利用天然优良的地理位置避免代价高昂的对欧洲事务的介入。

优势就在于专心致志地谋求海权，利用天然优良的地理位置避免代价高昂的对欧洲事务的介入。英国是一个海权国家，不是陆地国家或混合型国家。西利难免要向他同时代的读者推行他的理念。他在1883年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一书中说，现代世界包含了俄罗斯和美国这两个陆地大国，它们有着庞大的复杂政体，而这种复杂政体：

“由能够减少时空困难的现代发明所创造。这两个国家都有连绵不断的广袤陆地。在它们之间是更加强大的不列颠，它有着同样广阔但并非连绵不断的海域，大洋经过它流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有许多海洋街道的威尼斯世界一样。”

西利懂得海权能产生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但这些影响往往转瞬即逝。雅典人和威尼斯人都才华横溢，可当更大的国家崛起压制他们的自由时，他们的伟绩便告终结。西利认为一个更强大的英国能够与新兴的超级大国匹敌。他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一个以海权为基础、更加强大的不列颠是对未来的唯一

1 E.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这本书写作于美国独立战争前后，它的明确意图是为现代英国政治家们提供一个帝国衰亡的样板，使他们能够对其进行研究并避免类似命运。它是伟大的史学著作之一。关于这部不朽名著的起源和立意，可参见 R. Porter, *Gibb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88。

2 D. Wormell, *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s of History*, Cambridge, 1980, pp.41-42,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London, 1883, pp.1,43, 90。

保障。他警告说：对欧洲进行强力的介入会给大英帝国带来危险。在这时，对法国的人侵才刚刚被当成一种看似渺茫的威胁。即便未能预计1914年的政治局面，他也极富先见之明地说过：“我们迟早不得不失去印度，因为欧洲的战事迟早会迫使我们撤回英军。”<sup>1</sup>

西利的两部重要著作是《英格兰的扩张》和他身后出版的《英国政策的发展》。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详尽探讨国家的兴衰问题，特别是如何避免“衰落”。这就难怪为什么《英格兰的扩张》在两年中售出了8万多册，从而使他在政治家、新闻记者和帝国的建设者中拥有一群仰慕者：从罗斯伯里勋爵、约瑟夫·张伯伦和 W. T. 斯特德，到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塞西尔·罗兹。<sup>2</sup> 西利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影响了现代的“战争研究”。他对海权概念的使用是有节制的、微妙的，产生了强大的效应。许多深受马汉观点感染的英国人都赞同西利的看法。

西利的言论激发了要建立“更强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的运动。这个概念的涵义是要在英帝国不同的自治领、殖民地和属地之间建立更紧密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从而形成对散乱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岛屿、港口和腹地的罗马式的绝对统治。这既不可能，也不切题。到1870年代中期，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已经把帝国视为一个必须与人分担然后卸掉的包袱。在把耗资不菲的治理和防卫事务移交给定居者或者当地人之前，英国人还要教化居民、稳定局面和实现民主。如果定居区域的殖民地首先获得自治权，那么剩下的地方只需等待政治达到必要的成熟程度。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在20世纪的战争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积极提供的大批增援部队改变了英帝国的战略力量。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它们不需要被强迫或者在武力胁迫下提供支援。西利关于建立更紧密的政治关系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海洋帝国总是采取比陆地帝国更加松散的联邦体制。美国是从英国的海洋帝国中分离出来的，正如迦太基是从腓尼基帝国中分离出来的一样。在这两次分离中，政治权力都向经营商业的地方当局转移，从而产生了在税收和贸易限制等关键事务上享有自主权的愿望，造就了一个由律师和商人组成的阶层，而这些人拥有管理城市和行省所必需的技能。要把罗马式的中央控制体系强加在分散且专心经商的英帝国身上，这种做法引发了反叛，在美洲的结果便是造就了一个新国家。1782年以后，英国人对这个问题非常明白，所以尽量避免对抗当地人民的感情。过了一个世纪，这个教训开始被人遗忘，但其中的道理并没有改变。英国是新迦太基，不是新罗马。它缺乏构成罗马帝国的那般人力、资源和连绵不断的土地。英国人很高兴能够使用罗马帝国的文化语言来维持他们的自我形象，显赫的例子便是那座纳尔逊圆柱，但他们所真正关心的是要提防出现一个新的像罗马那样的大一统帝国。

1 J.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London, 1883, pp.288, 291-292 & 300-301.

2 Wormell, pp.129, 154-156, 179-180.

即便是那些鼓吹建立一个袖珍的英帝国的人也认为,有些事情必须集中掌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海上实力和制海权都密不可分,它们都需要集中掌控,并且保持一贯的做法。于是,英国人意识到几个关键地点必须留在帝国里面。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把这些地点称为能“锁住世界”的“战略要地”,它们包括百慕大、哈利法克斯、直布罗陀、马耳他、亚丁、开普敦、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地点已经依据地形修筑了防御要塞,拥有优良的交通与通讯系统、干船坞和海军基地设施,能够使一个海洋帝国在陆地帝国周围有效运行而不会引发冲突——除非陆地帝国要阻碍英国进入全球市场或海上通道。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英国人才投入战斗。

企图在帝国关税优惠制和更紧密政治联盟基础上建立一个内部联系更紧密的帝国,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从根本上说英国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它要利用帝国外部巨额海外投资的收益来支持进口,而这种经济控制在伦敦金融城手中。英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向来处于次要地位,所以约瑟夫·张伯伦的伯明翰永远无法取代伦敦金融城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利益。英国和美国各有其施展实力的领域,它们的发展方式也迥异。在重要利益上,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不同点。它们没有理由打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影响力、商业和控制权方面不是竞争对手。也正是为着这个目的,美国重建了海军。

1890年代美国人开始建立一支“罗马式”的海军,即一个陆地大国的海上武装力量。<sup>1</sup>建造这支舰队是为了作战和投送力量,而不是为了保卫海上通道和控制贸易。<sup>2</sup>在其后的50多年里,美国海军将在规模和战斗力上挑战英国海军

“迦太基式”的海权国家的海军,尽管它一直采取与众不同的“决战导向”形态。美国海军从来没有变成一支真正的海权国家的海军,因为海洋早已不是美洲的中心问题,也早已不是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的中心问题。1900年英国人承认美国是主宰拉丁美洲的地区性大国,他们缩减了部署在西印度群岛的海军力量,让美国人来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这是英国人对待地区性力量的典型反应。只要航运安全有保障,他们乐得把力量转移到其他地区。1898年美国人把西班牙人逐出古巴,巩固了对加勒比地区的控制。与此同

美国海军从来没有变成一支真正的海权国家的海军,因为海洋早已不是美洲的中心问题,也早已不是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的中心问题。

1 罗马人建造舰队是为了赢得战斗、确保海上安全,以便能够部署罗马的军队去摧毁诸如迦太基、马其顿和 Selucia 这样的对手,消灭海权诸国,控制对西西里、撒丁和埃及至关重要的粮食供应。美国使用海军力量的方式如出一辙,就是为打败对手国家的海军,以便在投送压倒性力量(靠入侵和空袭轰炸)之前保障海上安全。作战方法也许已经变化了,但基本构想并未改变。

2 S. C. Topik, *Trade and Gunboats: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in the Age of Empir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edition, edition, 2000 & M. R. Shulman, *Nav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Sea Power, 1882-1893*.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时，他们在亚洲获取了一个帝国的领土，占领了菲律宾。在这里，皇家海军所要确保的是由美国而非德国继承古老的西班牙帝国遗产。在并吞夏威夷之后，现在美国让它的力量跨越太平洋延伸到了亚洲，在亚洲政治中越来越多地发挥干涉主义的作用，这引起中国和日本等地区大国的惊恐。实际上，英国和美国开始了对海权的共治：英国人在欧洲承担主要责任，使美国免遭来自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潜在挑战；作为回报，美国掌控了西半球并日益在亚洲有所作为。正如海权理论的主要鼓吹者阿尔弗雷德·T·马汉所说的那样，这种安排合乎美国的根本利益。马汉劝说心存疑虑的美国政府转变陈旧的强调海洋对抗的权利观。美国在过去的120年里都致力于削弱海权对于弱小国家的影响，如今美国作为新兴的海上强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要对抗德意志帝国膨胀的陆地霸权就必须拥有海权，若想有效地做到这一点，美国需要借助经济战的强大影响力。<sup>1</sup>

英美关系中的决定性时刻在1914年到来了。尽管美德两国间有着重要的思想和人际纽带，美国还是决定支持英国和法国抵抗德意志帝国，因为对美国而言，德意志军国主义是比英国海权更大的威胁。民主和全球贸易对美英而言，都是关键问题。1917年，当德国人试图和墨西哥一起发动反美战争后，美国加入对德作战，美军帮助结束了这场战争。然而，美国总统无意接受英国海军的主导地位，他在1916年和1918年下令实施大规模的海军舰只建造计划，公然企图限制英国履行它的海战权，即搜查中立国船只和对敌国进行海上封锁的权利。依照计划建成的大型舰只都深思熟虑地用曾击败过皇家海军舰只的名字命名，或者用1776年到1814年间美国获胜的陆战战役名称命名。1942年前开始建造的每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都是这样命名的。事实上，美国人正在运用海军力量同英国博弈，因为无论是作为一个岛国还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英国都非常害怕丧失对海洋的控制权。当1919年这些造舰计划被削减时，它们成了美国人争取海上力量平衡的论据。在巴黎和会上，一场重头戏“巴黎海军之战”破坏了气氛，两国间的关系明显恶化。1914年英国有大量对美投资，而1919年这种经济上的平衡发生了逆转。美国靠保持中立地位财源滚滚，英国则由于要从纽约筹措战争物资和贷款支援俄国和法国而负债累累。

1922年的华盛顿协定避免了一场本来会把日本也拖进去的大规模海军军备竞赛。其结果是在适合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的水平上确定世界海军力量格局。这种低水平反映出美国国会对于海军拨款的勉强性。美国既不需要也不想建造一支能控制世界海洋的海军，也不希望英国有这样的海军。华盛顿会议削弱了英国海军的实力，极大地降低了海权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分量与外交影响。英国人对这个弱点看得很清楚，在随后举行的裁军会议（1927年在日内瓦、1930年在伦敦）上，

<sup>1</sup> L. M. Gelber, *The Rise of Anglo-American Friendship: A Study in World Politics 1898-1906*, Oxford, 1938, pp. 134-135.

他们提出英国需要建造更多的巡洋舰来保卫全球贸易航道。美国人对这种要求置之不理，因为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期望为舰船花费更多的钱，去保卫那根本不存在的贸易联系。对于美国而言，一支“举世无双”的海军是获得国内支持的政治魔咒，也是向英国施压的外交利器。193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建造这样的海军。不过，重整军备也是“新政”为减少失业而采取的一揽子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在这个阶段英美两国都避免发生公开的冲突，但它们之间的分歧反映了两国在文化、利益和观念上的深刻差异。由于法西斯国家开始进攻它们的邻国，这些分歧严重削弱了民主国家。只是在1940年6月法国陷落之后美国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美国的反应是开始向英国提供贷款、租借弹药和武器装备以把战争继续下去。正是在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才投入这场战争。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意识形态上对英帝国主义的担心都使美国人看不清比这严重得多的威胁。甚至到了1945年罗斯福总统都未能认清苏联构成的战略性威胁。当

海军的胜利只是一种有限的胜利，美国人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区上都部署了占绝对优势的陆军，从而完全锁定了胜局。

时美国海军的实力已经超越皇家海军，能够独立地赢得太平洋的海战。然而，海军的胜利只是一种有限的胜利，美国人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区上都部署了占绝对优势的陆军，从而完全锁定了胜局。罗马人在海上战胜迦太基仅仅是决定性军事打击的前奏，其后便是占领迦太基并给这个被征服的敌国带来强制性的和平。在欧洲，美军在强大登陆后彻底打败了德国人。在亚洲，美军对日本制定了类似的大规模登陆计划，只不过这个计划被新的作战方法取而代之了。美国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尝试依靠战略轰炸打败日本，原子弹这种武器使军用航空变为毁灭性的打击手段。美国人用原子弹达到了罗马在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布匿战争中使用大军和围困手段才达到的目的。当时就这种武器对获胜是否“必要”展开了辩论，它显示：陆军“决定性”战争的概念和海权论中“有限”战争的概念在基本战略上是截然不同的。海上封锁也许能够、也许不能迫使日本投降，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美国依靠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就赢得了战争，而这意味着使用陆基军力。

战争刚一结束，体现这种观念的现实就呈现无疑了。美国在复员军队时把陆军航空队改建为一个独立军种，主导这个军种的理念是使用核武器进行战略轰炸。1947年，新成立的美国空军会同其原先的主管机构陆军一道，试图撤销作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美国海军。空军要接管所有航空军务，而陆军则要剥离海军陆战队。<sup>1</sup>“罗马式”的美利坚环球帝国在海上没有潜在对手，也就没有一个战略概念能说明维持庞大海军的必要性。保卫海上通道和贸易的防务没有被考虑进去。由新成立的国防部推进的裁撤海军的工作直到1950年前都进展顺利，只是朝鲜

战争刚一结束，体现这种观念的现实就呈现无疑了。美国在复员军队时把陆军航空队改建为一个独立军种，主导这个军种的理念是使用核武器进行战略轰炸。1947年，新成立的美国空军会同其原先的主管机构陆军一道，试图撤销作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美国海军。空军要接管所有航空军务，而陆军则要剥离海军陆战队。<sup>1</sup>“罗马式”的美利坚环球帝国在海上没有潜在对手，也就没有一个战略概念能说明维持庞大海军的必要性。保卫海上通道和贸易的防务没有被考虑进去。由新成立的国防部推进的裁撤海军的工作直到1950年前都进展顺利，只是朝鲜

<sup>1</sup> G. Barlow, *The Revolt of the Admirals: The Fight for Naval Aviation, 1945-1950*,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1995.

战争的爆发挽救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冷战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要准备抗击的敌人，由于苏联舰队的崛起，美国以史无前例的平时期的海军建设作为回应。从1950年起美国就无可争议地成为海洋的主宰，它的海军实力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海军的总和。正如罗马和其他偏重陆战使命的海军那样，现代美国海军在战斗序列里重视海军陆战队的地位，追求的是从海上投送力量，在岸上进行战斗。

1945年以后英国人试图维持他们的海权，但这种努力以惨败告终。英国完全破产了，迅速丧失了对帝国系统的控制权，而这个帝国曾支撑了一支大洋海军并对它的存在提供了正当的理由。英国人接受了美国将成为头号海军强国的新现实，因为英国资金匮乏，无法同美国竞争；并且美国不仅不会威胁英国的生存，反而承担起确保海上贸易通道安全的关键责任，而这种责任原本是英国海军存在的主要理由。英国人运用他们最后余下的信用和资源把美国人拉入一项有约束力的条约，承诺保卫西欧免受隐现的苏联威胁。1948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海权的三叉戟传给了（即便只是在名义上）一个西方的民主联盟，而不是一个国家。

这个过程绝非是一帆风顺或协调一致的。1956年英法试图重夺他们从前拥有的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美国人阻止了它们的行动，从而释放出中东民族主义的幽灵，增加了石油供应的风险和成本，为从此支配这个地区的那种暴力的、不稳定的政治铺平了道路。这种纯粹伪善的行为来自那个制造了巴拿马国以便开凿另一条大运河的国家，而这在美国分析家那里几乎就不是个问题。对于西方海权国家来说，失去那条人工水道控制权所产生的战略性后果难以计算。1956年的悲剧令英国不再怀有任何挥之不去的幻想，即希望也许能保持其20年前能够行使的全球霸权的一小部分。它把真正的海权留给了一个充满大陆思维的美国所领导的集体。

尽管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但英国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中找到了一个重要位置，因为两国都认为苏联是对他们的利益的最大威胁。英国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盟友，就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那样，皇家海军专注于保卫贸易和海上安全这类典型的海权使命，从而让美国海军承担一支大陆海军的“陆军”使命，聚焦于海战和力量投送。美国舰队以航母舰载航空兵、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弹道导弹潜艇为代表，英国和日本的舰队则以驱逐舰和护卫舰这类护航舰只为代表，这绝非偶然。

雅典、迦太基和葡萄牙最终都被陆地大国毁灭了。英国如同威尼斯和荷兰那样，依靠技巧和谨慎控制了自己地位的下降。相比而言，海上霸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是没有痛苦的，因为这并不是同一水平上的转移。两个国家在所有方面，尤其是战略文化方面都存在着如此大的根本性差异，以至于1782年以后它们在任何时候彼此都不构成实在的威

两个国家在所有方面，尤其是战略文化方面都存在着如此大的根本性差异，以至于1782年以后它们在任何时候彼此都不构成实在的威胁。

胁。英国人从未试图恢复他们以前的殖民地，美国人从未想要征服不列颠。英国放弃了它的海上霸权以满足经济需求，它这样做的时候未经任何斗争，因为海洋统治权正在转移给一个大国，而那个国家将采用两国通常可以接纳的方式运用这种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后一个依赖海军力量的大国离开了国际舞台，从此以后，世界霸权将属于陆地大国，属于依赖陆上和空中力量的能够自给自足的军事大国。海洋将在冷战的战略中发挥边缘性的作用。

处于边缘位置上的海权依然重要。在1982年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中，美国的支持使英国获得了重要的优势。当所谓的欧洲“盟国”拒绝向英国供应炮弹时，美国出手了。美国还提供了最新型的空对空导弹、外交掩护和许许多多的其他援助。作为回报，英国答应不把阿根廷人打得太狠。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只有皇家海军始终同美国舰队并肩作战，这无疑反映了双方深厚而长久的关系和两军交叉训练的结果。冷战的结束使全球平衡重新偏向海洋。世界贸易的蓬勃增长和对资源的依赖使得今天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同以往一样重要。当代英国享受着海权带来的大部分好处，却无需被迫承担维持与这种海权相适应的庞大海军的代价。但是，随着美国海军未来的发展方向再一次成为问题，这种幸运局面可能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般持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正在建造两艘大型航空母舰。

（徐彤武 译；李晨 校）